

李大釗

王朝柱 著



王朝柱 著

李大钊

楚图南题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0480

1180 480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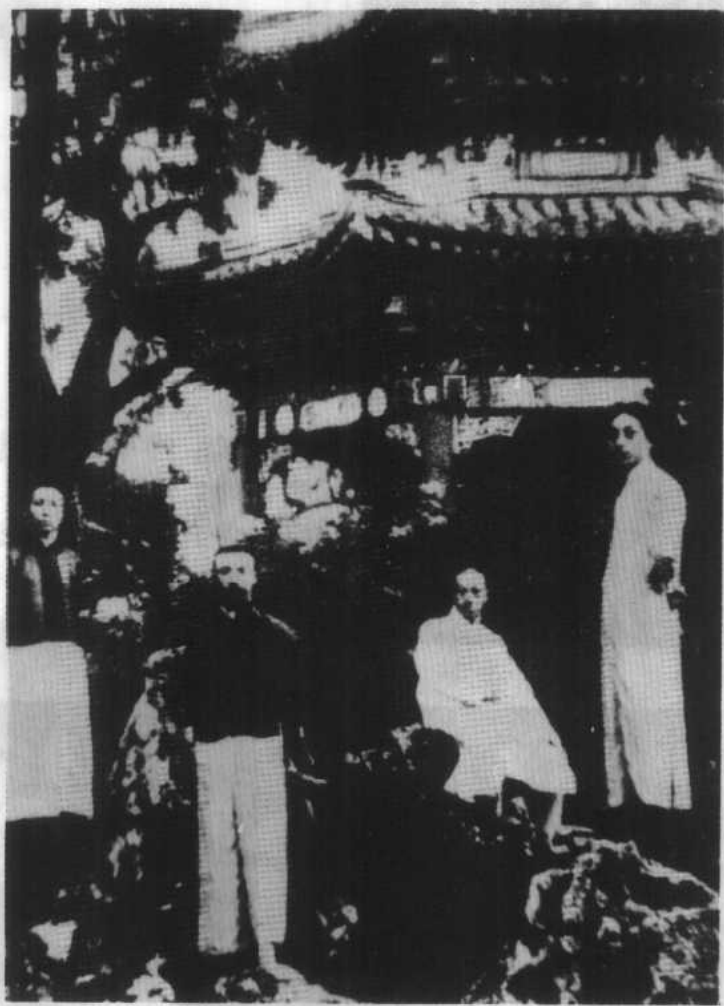




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就义前。



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同志（左二）
和张申府（右一）、梁漱溟（右二）、
雷国能（左一）在北京中央公园合影。

12009 51
第一篇

(一)

一九一三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天将暮时，海上刮起了大风，一艘驶向日本的客轮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埋入涛底，艰难地航行在万顷狂涛中！

站在船头手扶栏杆的乘客，是一位体魄魁梧的年轻学者。他身着青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天庭饱满，发型偏分，两道浓浓的眉毛稍微耿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从镜片那圆圆的密纹可知，双目是高度的近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撇黑黑的八字胡，显得有些斯文、潇洒，再配上那深沉、凝思的面部表情，俨然像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形象。他就是年轻时代的李大钊。当时名叫耆年，字寿昌，时年二十四岁。

李大钊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清廷退位了，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激动地淌下了滚滚的热泪。不久，孙中山先生上了袁世凯甜言蜜语的当，把这个窃国大盗误作好人，天真地向他交出了大总统的职权。袁世凯上台以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在民国招牌的掩护下，实行个人独裁，排挤镇压革命党人。李大

钊怀着异常悲痛的心情，看完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这幕悲壮的史剧，为了求索新的救国之途，毅然加入了陈翼龙发起的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了天津支部。一九一三年，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袁世凯授意亲信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枪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宋案”。旋即又于四月二十六日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向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协定，以资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把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镇压下去。这时，李大钊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先生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愤然在南方组织讨袁军，演出所谓的“二月革命”。由于敌我军事力量悬殊，加之讨袁军内部涣散无力，缺乏统一指挥，“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孙中山先生也悻然转赴日本。与此同时，袁世凯疯狂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社会党领袖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在此期间，他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

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葆华儿和星华女，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站在甲板上告别了同窗好友白坚武、俞德等人，也告别了读书六载的天津卫，乘船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古老的东方最先欧化的城市。它不仅云集了日本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精英之士，而且还是东方唯一允许诸家学说相对并存之地。毫不夸张地说：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京，风行着世界上各种主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相近的治国传统、伦理观念。用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话说：“日本富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日本的富强道路呢？”因此，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日本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水平。我国清末民初的领袖人物，无一不和日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东京也的确变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组织爱国团体、秘密制订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自然，它也是日本当政者策划入侵中国的大本营！

在东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聚集着中国各派势力的后起之秀。由于身在异国，其言论和信仰相对自由一些，因此这些后起之秀把国内的斗争，搬到了日本，而且愈演愈烈，真是到了冰炭难容，只有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比方说：清朝皇帝虽已退位，但是康梁保皇党的余孽却根植于留学生中间。只要看见那些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身着长袍马褂的留学生，便一定是三呼万岁的保皇走卒！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想借外国的钱——尤其是日本的钱扩充势力，消灭革命的力量，使自己

成为一统天下的独裁者，留学生中间就应运而生了一批高呼袁世凯万岁的分子。随着形势的转化，这批拥袁分子又与保皇走卒合流为一，高举国故的复辟大旗对抗革命，并在留学生中间密查革命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等领袖人物亡命日本，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分歧。留学生中间的同盟会员有的灰心退盟，有的声言“缄口不谈革命”，当然也有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者！姑且不谈留学生中间的革命分子与保皇、保袁派的争斗，就说革命党人之间的论战吧，也足以可观了！假如再把留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探求社会主义者……加在一起，那才真是一台混乱不堪的戏剧！

一天上午，李大钊为了考察近代日本侵略我国的历史，到日本《游就馆》参观。他随着人流步入战利军械大厅，使他大为惊诧的是，陈列有序的所谓“战利品”多为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缴获的中国兵器，顿时，一种民族屈辱感涌上心头。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离去。突然，大厅中骤起的喧闹声，把李大钊从痛苦的沉思中唤醒。他循声望去，只见参观的人流涌向陈列大厅的尽端，很快围成一堵人墙，外层的观众翘着脚尖、伸长脖子向着圈内探头张望。俄顷，他从嗡嗡的人声中听出有两个声音最大、最响，待他听清是操着华语对吵、大骂之时，便完全判定围在圈内的主角是两个打架的中国人。他急切想弄个明白，用力分开围观的人墙一看，原来是一位清末遗少打扮的留学生，正在和一位着西装的留学生大声争吵。他再仔细一看：那位清末遗少打扮的留学生留着长长的

辫子，蜡黄的脸，细长的个头，嶙峋的骨架撑着一身长袍马褂，其形象可谓是见棱见角，活像是一个抽大烟、吸白面、天天混迹于妓院的八旗子弟；那位着西装的青年，戴着一顶法兰西小帽，身材魁梧、浓眉耿立，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气。突然间，那位身着西装的青年火气大发，一把揪住那位清末遗少装束的留学生的衣襟，愤然朝怀中一拽，险些把对方拉倒，遂即又破口大骂：

“你这条保皇狗也来参观了？快把你的狗眼睁得大大的，看看日本人的这一件件战利品吧！在这《游就馆》中，你总该夹起狗尾巴了吧？”

“这、这和大清帝国无关！……”留辫子的青年战战兢兢，浑身就像是筛糠似地打着哆嗦，他的嘴巴不听使唤地狡辩说：“这、这都是洋务派头子李鸿章……还有你们这些小洋奴才，主张办……办洋务的结局！……”

“胡说！”西装青年气得脸色发青，用力一推，留辫子的青年向后倒退了几步，如不是围观人群的阻挡，他一定会摔个仰面朝天。西装青年一眼看见了那条在身后左右摇摆的辫子，顿时怒火燃胸，愤慨地骂说：“满清王朝完蛋了，你这条狗尾巴似的辫子还舍不得割？今天，我非帮你革革命不可！”

“你、你敢！……”留辫子的青年边说边躲，想借机溜掉。可是，围观的人墙太厚，一时又找不到逃走的地方，吓得汗颜心虚，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和你拼命！……”

西装青年突然从裤兜中取出一把剪刀，大声狂笑着趋步近前，一个坚决要剪，一个死活不让，二人便扭打在一起。围观的日本人就像是观看柔道比赛、相扑表演，发出阵阵的哄笑声。有顷，西装青年脚下轻轻一踢，留辫子的青年“哎”一声，摔

倒在地上。西装青年俯身欲剪对方的辫子，随着一声大吼，几位工作人员赶到近前，强行把他们分开，不容分说，一齐推出了《游就馆》的大门。

李大钊目睹了这幕闹剧，他听着参观的日本人轻蔑的谈笑声，心头就像是压了一块千斤石，憋闷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无心再参观记录中华民族屈辱的《游就馆》，心情格外压抑地走出了陈列大厅。当他刚刚走出《游就馆》的大门，熟悉的吵骂声又扑入耳畔，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看见那位西装青年站在门前，手里仍然拿着那把剪子，望着仓皇逃去的留辫子的青年愤然大骂“保皇狗！……”他快步走到西装青年的身边，神态严肃，却又是善意地说：

“同胞！您的义举是可钦佩的，但您不应该选择在这样的场合行事。”

“这……”西装青年望着这位陌生的中国同胞，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迟疑了片时，竟然十分爽直地说：“您的指责是对的！可我当时一看到陈列的兵器，再一看到他脑后的辫子……”

“就压不住怒气了，对吧？”

西装青年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李大钊很是喜欢对方这种大起大落、敢于向陌生人承认错误的性格，甚是高兴地问：

“同胞！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复姓司徒，名复兴。请问同胞您的……”

“姓李，名大钊，字守常。”李大钊主动地握住司徒复兴的手，十分客气地说：“我来日本求学的时间不长，今后，还望复兴君多多帮助。”

“不必客气！俗话说得好：它乡遇故人，不亲也是亲嘛！更何况您我皆为流落异邦的同胞呢。”司徒复兴从这简单的谈话中，已经没有了陌生人相见时的矜持和隔阂，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之后，又问：“大钊君，您准备报考东京的哪所大学？”

“我已经考取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司徒复兴听后十分高兴，告诉李大钊自己也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在政治本科就读三年级。接着，他又以高班同学的身份，主动地介绍了早稻田大学的情况，以及在政治本科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的政治信仰、派别组织。旋即把话题一转，又问：

“大钊君！请问您的政治信仰……”

“我还没有完全形成！不过，我是极力主张倒清讨袁、反对复辟倒退的！”

司徒复兴听后，非常兴奋，那种陡然生起的亲热程度真是难以言述。当李大钊询问方才那位留辮子的青年有关情况时，他又猝然变色，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

“他是一个清末的遗少，又是康梁保皇党的忠实走卒，公开声称愿以其身殉朝廷的保皇小丑，在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叫刘羽！”

李大钊和司徒复兴一见如故，谈兴不衰，二人离开《游就馆》大门前，继续边走边谈，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鉴于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近期准备召集流亡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总结经验，检讨得失，决定重新建党，以便集结革命力量，策划讨袁的“三次革命”。当李大钊询问对神州大陆的命运有何

高见时，司徒复兴却万千感慨地说：

“我原是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是，自从中山先生奔波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去之后，我便如坠五里雾中。换句话说：已经看不清神州大陆的光明了！”

一路上，李大钊除了解到司徒复兴的政治信仰、革命经历外，也很能理解他面对革命处于低潮所产生的犹豫、彷徨的心情，故不再深谈此事，转而征询辛亥革命彻底失败的原因。司徒复兴详细谈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后，又结论似地喟叹说：

“辛亥之役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铸成的！但究其主要者有二：一是革命党人的幼稚，再就是我们的同胞太愚昧、落后了！”

“那，为何不做唤醒民众的工作呢？”

“大钊君！谈何容易啊……”司徒复兴情绪低沉、感慨不已地说：“我们的同胞已经愚昧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了！我多思启蒙之道，总觉得不搞一点惊心动魄的大行动，是不足以唤醒这即将死去的民族灵魂的！”

“复兴——！”

远方突然传来女人的喊声。李大钊循声望去，在不远的前方，有一位穿着和服，年龄不过二十来岁，有着艺术风韵的日本女郎在微笑着招手。这时，结伴同行的司徒复兴急忙说了一句“大钊君，对不起，改日再深谈吧！”遂急步追去。李大钊伫立在原地，好奇地望着司徒复兴挽着这位日本女郎，亲热地说笑着离去的背影，不由得自问：

“难道这是复兴君的女友？……”

李大钊猜对了，这位日本女郎就是司徒复兴的女友，名叫樱子。翌日傍晚，司徒复兴在拜访李大钊的时候主动谈的，而

且说的是那样的简单、浪漫：“今年在樱花盛开的时候，我徜徉在大森海湾的岸边，突然被那美妙的《樱花曲》所吸引，循声寻觅，原来是一位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在望着盛开的樱花构思作曲。她说是我的出现给了她灵感，当即便说她应当回报给我爱情。就这样，我们开始相爱了！哈哈……”李大钊听后不为所动，只是淡然地笑了笑。司徒复兴自小崇尚侠义，又是一个像火一样的热心青年，当他完全地信任你了，愿把心中的一切掏给你，哪怕是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他看到李大钊对他说的浪漫情话不感兴趣，便又很直爽地和李大钊探讨起爱情来：

“大钊君！您信不信我所说的事？”

“信！但绝不会是如此的简单。”

“算您说对了！不过，我还是从中体验到了所谓爱情的甜蜜了。”

“我看啊，您只有尝到了爱情的苦楚，才会更多的知道爱情的甜蜜。”

“哈哈！没想到您竟然是一位爱情哲学家了！大钊兄，在国内您不会有过我这样的爱情吧？”

“是的！没有经过您这样听《樱花曲》的爱情，不过……”

“您迟早会赢得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在国内永远追求不到的爱情的！”

“不！您完全说错了，我远在十多年前已经赢得了所需要的爱情了！”

司徒复兴闻之瞠目，再一想李大钊的年龄，一切都明白了，他严肃地指责李大钊，说他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但李大钊却不以为然，因争论无益，遂一笑了之。

年暮岁底，李大钊搬进了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前院居

住，与司徒复兴合住一室，朝夕相处，同窗共读，几乎天天的课余时间都在探讨国内形势的发展。不久，刘羽等一批拥袁保皇的留学生搬进了青年会公馆的后院居住。由此，小小的青年会公馆，便成了诸派思潮唇枪舌剑、比试高低的战场了。

逾年七月，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会后，他秘密向李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党章，并征询入党的意见。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途为借口婉言谢绝了。

近一年来，李大钊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二十世纪初叶，自打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迄始，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中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利用课余时间埋头攻读。

是年中秋的一个晚上，李大钊临窗伏案，继续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司徒复兴不知何故郁闷不乐，坐在对面墙下的桌前一边哼唱古曲《满江红》，一边挥毫书写“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顷许，他掷笔桌上，将写好的《满江红》词揉成一团，弃之桌旁的纸篓中。他站起身来，继续小声哼唱着，在室内踱步凝思。当他信步走到李大钊的背后，无意地看了一眼李大钊那聚精会神读书的样子，小声地问：

“大钊君！又在研读哪家的著述？”

“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司徒复兴闻声突然大笑起来，伸手拿起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看了看，意外地说：

“我敢担保，您是我国第二位研读此书的！”

“那……第一位是谁？”

“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原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其父宋嘉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同时，又是孙中山先生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宋庆龄幼年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后留学美国，并于一九一四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韦斯莱茵女子学院文学系。不久，又来东京探望父母双亲。其时，宋嘉树因身患肾炎，难以继续充任其职，就让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先生处理英文信件，随后便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

关于宋氏的家世，李大钊在国内就有所耳闻。至于宋庆龄女士为何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则是近期从司徒复兴处获悉的。然而宋庆龄女士为什么要研读《共产党宣言》，却百思不得一解。当他求教于司徒复兴，也只能得到“她自幼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涉猎之广，望尘莫及”的回答。有顷，司徒复兴把《共产党宣言》一书放回原处，随意地问：

“大钊君！读后有何感想？”

李大钊稍经思索，郑重地答说：

“书中的立论新颖，闻所未闻，刚刚研读，一时还难以理解。”

“我更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可以帮您请到一位深研此种主义的导师。”

“是辛德秋水先生吗？”